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选择

李义虎

国际格局是中国生存与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走向强盛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也是谋求中国自己应有国际地位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中国与国际格局的关系,即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是中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既会影响到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又会影响到中国外交活动的根本方向,归根到底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地位能否确立和维持。国际格局的构成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不可能超脱于这一客观存在,而必须在这一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在制定和调整时必须考虑国际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地缘、军事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因素,必须考虑全球性、地区性和周边性格局的配置情况。这就是中国国际战略对国际格局客观存在的适应性或者因应性,正确的国际战略应该是对国际格局客观存在和中国在其中位置的正确和准确的反映。

同时,中国的国际战略也有一个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基点上进行主动和积极选择的问题。在变化的国际格局中,如何顺势营造中国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国自己的国际战略目标,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许多国际战略上的“大手笔”都是既尊重国际格局演变的客观现实及其规律,又能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主动作为。因此,在研究和分析了国际格局之后,理应考察中国在

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在这种格局中所能扮演的基本角色,从而在正确判断和选择的基础上作出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并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带有主动性。

一、正确判断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经济力量 and 综合国力的强大是中国保证大国地位和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实力基础,是处理中国与国际格局关系的关键。经济力量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综合国力的强大为推行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因此,搞清楚中国的国际地位,搞清楚中国与国际格局的关系,必须对它的经济力量 and 综合国力情况有准确的估计。二是必须有成功的外交,成功的外交是保证中国大国地位和作用的充分条件,是保证中国在国际格局中获取应有的重要地位的基本手段。经济力量 and 综合国力的强大并不能完全保证中国充当大国的角色,必须配合以作为软国力的外交,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强国。在实现走向强国目标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处于崛起过程中时,经济力量 and 综合国力比较强大、但还不够强大时,外交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把握国家力量 and 外交运用之间的平衡,就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内容。

在国际政治意义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从

弱国走向强国的过程,是中国崛起的过程,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中国重新在国际格局中确定位置的过程。特别是,中国既要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又要走向经济大国;既要在目前充当地区性大国的角色,又要树立全球性大国的目标;质言之是在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中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一极”。这一整个过程的终结点是中国在具备全面国力的基础上成为全球性大国。但是,目前中国仍需准确判断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格局的关系,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地区性大国现状和全球性大国目标的关系。

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力量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使中国具备了更加有利的国际地位。所谓崛起就是指国家力量或综合国力的趋于强盛和国际地位的趋于提升,这种“趋于强盛”和“趋于提升”是一种尚在变化之中的过程,而且这种变化是由现有状态向不断升高的方向发展。从经济力量发展和综合国力看,现在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名列世界前10位,综合国力为世界第六位,并可能在21世纪前20年内成为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大国,综合国力会进一步提高。因而可以被视为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中的“一极”,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政治上看,中国是构成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大国关系中是一个重要的大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的主要大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可以被视为政治多极化中的“一极”。在国际地缘格局中,中国由于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和关键,国土面积广阔和人口众多,因而可以被视为地缘政治上的“一极”。在地区关系格局中,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可以被视为该地区关系格局中的“一极”。在军事上,中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不多,但最大射程已达1.2万公里

里,是世界上除俄罗斯外第二个可用洲际导弹对美国本土实施核突击的国家,因此也是世界上拥有重要的军事力量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具备了成为未来全球性强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作为不能超越它的实力水平,不能对自身实力作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否则会导致国际战略的失当。^[1]目前,中国还不是全球性大国,在综合国力方面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还不能同日而语,在经济实力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方面与美俄还有若干距离。即使从中国崛起过程看,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新兴大国,在经济上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大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中国虽有一个大国的地位,但在另一些尚未受到重视的领域,似乎又很难与大国地位相称。而且,从总体上看,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所以,虽然充当全球性大国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战略目标,但依中国现有的国力只能使它首先被看作是地区性大国,即亚太地区的大国。中国对于亚太地区之外的事务则鲜少能够产生影响(例如,对中东地区、欧洲地区或非洲地区等)。中国在近期内的国际地位定位,就是做以全球性大国为战略目标的地区性大国。

辩证地看待中国与国际格局的关系,需要注意到如下几点:

首先,中国尚不具备挑战和改变现存国际格局的力量和能力,因而不可能是现存国际格局的挑战者,但是中国可以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格局的塑造,促进现存国际格局朝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格局现状下实行积极参与的政策,最符合中国国际地位的实际状况。“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靠自身变革和国力增强是中国确立和保持国际地位的基本源泉,“中国自身的变化将影响世界”,将影响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3]如果依中国的综合

国力再加上中国外交有力,就会获得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格局中游戏规则的权利和资格。

第二,现在,中国正在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以融入国际社会主流,但是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都具有独立自主的特性。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问题上表现出了十分鲜明的个性。例如,中国奉行不结盟、不搞集团政治和不当头的政策,倡导新型安全模式,都是保持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独特地位的主张;又如,中国所提出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一个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主张,与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存在着尖锐的矛盾。^[4]中国的主张对于维持现行的一套国际关系运行方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独立自主的主张和有力的外交作为在各个大国中是少见的,成为国际格局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第三,中国具备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存在着很有利的大国前景;然而,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也是时有变化的。在某些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比较强大,某些时候则比较柔弱;在某些问题领域,中国具有强大的发言权,在某些问题领域中国的发言权则较小。比如,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在亚太地区之外影响力尚弱。中国虽然只在亚太地区拥有影响和发挥作用的空間,但由于它在地缘政治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而对其他地区的事务也存在着间接的影响(如中东阿拉伯国家希望中国在中东问题上也发挥作用)。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如 NMD 和 TMD 问题),美国比较忽视中国的影响,但欧洲和俄罗斯希望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此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主要成员,在道义和政治上对全球事务负有责任,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大国也不能忽视的。

第四,如果以复合型国际格局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复合型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多重性,因此需要从这种复合型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加以考察。中国是多极化构置中的重要力量,在过去曾作为大三角关系中的重要一角而成为与两极化交叉的重要因素,现在则是反对单极化的主要力量。这是由于苏联解体使两极格局中的一极消失,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凸显。虽然国际格局的这种演变更加凸显了中国与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即单极化之间的对立,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和单纯;但是,从复合型国际格局的结构看,中国是处在多极化与两极化、单极化三种力量构布中的特殊存在,是复合型国际格局的唯一处于交叉点上的大国。在经历国际格局新的调整变化后,特别是很好地处理了复合型格局的基本矛盾后,中国将会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将获得自己应有的强大的国际地位。

第五,应该看到,多极化对中国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存在不利的一面;多极化既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又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复杂性。在虚幻的多极化过程中,中国有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而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的扩大化作为地缘政治变动的两个焦点,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面临着挑战。只有在多极化的积极有效发展中,中国才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90年代以来,在国际格局总体中各主要力量中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得最快,俄罗斯实力下降得最明显,日本和德国的实力地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欧盟作为整体的实力在近一、二年刚显示出增长的苗头。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集团的实力地位的变化,都没有改变90年代初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结构。这就是国际格局方面的主要情形,也是中国寻求自己国际地位的主要背景。因此,中国必须在推动多极化进程的同时,积极谋求多极化的合理发展,并时刻注意找准自己在多极化中的位

置。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应该如实地把自己定位为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性大国,^[5]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并不能起主导作用,中国现有的基本国力要求它不能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冲撞。但不考虑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也是难以构筑新格局的。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平衡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毫无疑问,只有认清国际格局及其特征和中国的准确位置,才可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

二、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问题

国际格局基本结构和地缘政治态势的改变,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处境和所具有的位置,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是什么。第一,我们必须有判断;第二,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一句话,对中国外交要进行深入思考,而且必须以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来进行这种思考。要全方位地通盘思考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不能仅仅限于对外交政策的适应性的被动调整上。由于国际格局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动,中国的国际战略应该在这种变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不断进行新的选择,不能只停留在静止的水平上。如果国际格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我们的国际战略没能跟上这种变化,我们就可能处在非常不利的境地。因此,中国国际战略应该是动态调整的产物。

同时,在有力推进经济建设以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应格外注重以外交增加国家力量。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结构大变动的时期,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应付力量失衡的动荡和冲击,它完全可以通过发挥外交的作用加强自己的力量份额和改善自己在国际上处境。所以,外交战略和外交意识如何,也是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等国力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外交战略,可以提升

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而一个不好的外交战略,可能削弱本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中国是否是一个世界大国,不仅要看经济实力、人均水平,而且也要看其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包含了外交上的指标,如果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发挥重大作用,以一种孤立主义的角色来定位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不会是一个世界大国。发挥外交的作用,包括使用多种外交的方法。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必须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有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一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目的,以邓小平高度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分析新情况,寻找新思路,探索新的战略。

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思考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问题,要改换思维导向,即以实事求是、通权达变为思维导向。过去学者图解政策造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特定的氛围下国际上出了大事,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认识和判断,在战略考虑方面不敢往大的方面想。这实际上是保守思维和回避现实的积习。现在,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发生了大的、历史性的变化,需要人们有大的思考和深层的思考,也要想一些过去没想过的、不敢想的东西。要有敢变的判断和能力。例如,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仍然是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但是它也有一个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积极参与的变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十分辩证的,所以也要以动态的观点来加以认识。韬光养晦是十分重要和明智的,有所作为、积极参与也是十分重要和明智的。原来我们是韬光养晦,致力于营造建设现代化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的主要工作着眼于“营造”上。由此奉行了多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

行了不结盟、不参与集团政治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政策。但现在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需要中国主动积极地参与;适应中国经济成长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现实,我们已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开展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因此,外交的主要工作已转到着眼于“参与”上。从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转向争取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和外交空间方向的目标,即从被动转向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变化或者说转变。今后,仍应沿着这条路线推行国际战略和开展对外关系。又如,国际格局现在是复合型的、多层次的,所以考虑问题也必须是多层次的、复合型的。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及中印关系都处在复合型国际格局制约之下,都已不是过去单一型的关系形态。这些都说明,实事求是仍然是制定和执行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通权达变是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灵活性的根源。

2、国家力量和综合国力的增长是中国战略选择和外交行动的最重要的基础。只有使自己的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才能使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得以提高。中国应该依照国家力量和综合国力的发展状况进行自己国际战略的选择及其调整,使国际地位与国力总量相适应。2020年,中国的经济力量和规模有可能接近或达到美国的水平,到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行为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虽然届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不会很高,但国家力量的总体规模决定战略选择方向和外交行为,人均国民收入并不是决定它们的主要因素。因此,既要时时刻刻注重加强自己的国家力量和综合国力,又要平衡把握国家力量和综合国力与战略选择和外交行为之间的合理关系。

3、继续保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就是要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意志,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冷战时期中国曾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

一支重要力量,现在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和地缘力量。多年来,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在世界上和国际格局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安全的无价之宝,也是谋求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有利地位的基本途径。它说明,中国这个大国与别的大国是不一样的,它的作用是具有特殊性的。但是,也应认识到,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是分割开来的东西。它要求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要求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在调动国际力量资源和使用谋求均势方法方面的主动性。独立自主外交不是孤立主义和新孤立主义,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个性化外交。现在,独立自主外交仍以维护长期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战略目标,但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加强怎么维护的意识。如果说8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追求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变化了(如美日同盟强化、TMD问题和北约东扩等问题在邓小平时期还没有出现),就必须增加新的、大的和有利的措施,以确保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服从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具体说,美日同盟强化、北约东扩等对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不利的,所以必须用其他的国际力量组合来应付局势的变化,以便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同样是独立自主外交的表现。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下,独立自主外交必须增加新的内容。

鉴于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战略。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战略就是既要面向地缘格局的东向,又要面向地缘格局的西向;在国际格局结构上,既要处理与单极化的关系,又要协调好多极化内部的关系;既要办好自己的事,又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既要不当头,又要敢于树立自己的旗帜;既要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又不要不切实际地把中国推向国际对抗的第一线;既要与发达国家处理好关系,又要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要稳妥推进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又要积极发展与小国的关系;既要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以推动与各国的经贸关系,又要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多边政治安全合作机制。

4、中国自己在面临着继续营造现代化建设所需国际环境的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环境变动所带来的挑战。对此,除了增强危机意识和应付性办法之外,最主要的是应在国家战略中采取结构性的办法。也就是要在国家战略和总体外交中作出全盘的战略规划,而不是片断、局部地应对。实际上,恰恰是结构性办法具有较好的隐蔽性。例如,在历史上,拿破仑战争期间反法联盟的七次组合,都是不断利用力量结构性变动的方法寻求于自己有利地位的先例。而在当代国际格局变动中,印度就时时利用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其中的矛盾,为自己寻找有利的位置。在70年代,中国不用在具体问题上与苏联直接对抗,但采取了联美等结构性方法而确实使苏联感到害怕。现在,我们采取新的结构性办法,符合“既韬光养晦,又有所作为”的方针。它要求国家战略和外交整体性的相互配合。具体而言,所谓结构性办法是在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及美日同盟强化等国际格局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动的情况下,以另外的对应结构性办法加以反制。现在,在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中,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所采取的结构性联合办法是十分现实和有效的,中俄等五国所建立的军事领域信任关系已经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中俄法三国协调行动,制约了美英两国的作用。这是多极化结构性作用的明显反映。在科索沃问题上,中俄两国反对美国和北约的行动,具有潜在的结构性意义,但这种结构性的反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些实际的国际事务中,中国还不排除与欧洲大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合作,

以产生结构性作用的效果。

5、中国所面临的基本国际格局是一种复合型的格局,既不是单纯的多极化,也不是单纯的单极化,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这两种矛盾的趋势同时并存的过程,这种矛盾的趋势还会存在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国际格局出现了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行单极世界的意图也时有表现。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双重结构中,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应着眼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多极化,抵制和反对单极化的企图。考虑到国际格局的复合型特征,在多极化进程发展而同时单极化因素仍然存在、两极解体的能量尚未散发完毕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两极化的因素制约单极化因素。考虑战略问题时如何利用多种因素都要加以考虑。总之,中国在国际格局整体,包括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国际地缘格局和大国关系格局、地区关系格局各个方面,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战略考虑。

6、培育多极化因素,夯实多极化构架的基础,巩固多极化构架的支柱,遏制美国单极世界的企图,要有机制性的做法。中国积极推进多极化,寻求在多极化进程中重要一极的地位,这是现实主义外交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多极化外交模式,中国的多极化外交是多种形式的多极化外交。但是,其中仍有发展多极化制衡格局及其机制的问题。只有使多极化具备强有力的机制,才能让多极化趋势压倒单极化倾向,才能推动多极格局早日形成,也才能为中国提供广阔的外交活动空间和战略纵深回旋余地。所以,中国应该积极开展多极化外交,但多极化外交的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机制”上。

7、在结盟与不结盟的关系问题上也要有新的思路。实际上,在这方面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结盟、不结盟和非结盟。它们都是国际关系和国际力量配置的方法,都是服务于有效战略目标的手段。中国应该采取哪种方法

和方式,必须从国家最高利益上加以考虑和选择。不要因短时利益而冒然参与任何结盟关系,也不要因宣布不结盟给自己捆得太死。中国易于采取某种中间的形式,即非结盟方式,这意味着中国不公开宣布结盟,也不公开宣布不结盟,而要在目前在上述三种关系中确立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力和地位,在结盟与不结盟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灵活性。中国是最早反对建立集团政治和军事结盟关系的国家,把它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应有之义,同时把它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条件。但把目前中国的国际战略建立在不结盟基础之上,很难应付北约组织和美日安保同盟的扩大化所构成的威胁,也就是说中国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战略遭遇着很大的挑战。[6]所以,根据目前国际形势中国采取非结盟的政策更合适。中国作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可以在改组国际力量结构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中国以独立自主外交和全方位外交的有机配合根据国际格局的结构变动所进行的战略选择,说明要在结盟与不结盟之间保持某种弹性和变化的余地。今天,中国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方针,但实际上应更注重全方位的结构性安排。例如在现在的大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充实更具体的内容和灵活的形式,使之对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更富于影响力;使之足以对美国 and 西方国家强化军事政治同盟的做法给予反制。[7]

8、考虑到地缘政治的新变化,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东向和西向的战略交集点的变化,对于中国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本选择来说,有一个如何在东西之间左右逢源、运用自如的问题。在目前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态势下,如果把中国东西两向的国际格局和地缘形势结合起来考虑,也有可能产生一种带有类似于三角关系中两弱对付一强的后果。北约东扩的压力给在俄罗斯身上,效果却可能出在中国这里。俄罗斯如果再迈过界

线,更直接地“面向东方”,另一种以制衡美国为主要目的的三角格局便可能出现。这样,必然会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构想和部署造成压力,制约它在中国“东边”的行动。这从反面说明了中国所处国际环境中的可利用因素也是存在的,这就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新的战略选择空间和重大外交机会。现在,中国国家战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正处于什么样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位置上,而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钥匙又在哪里,我们如何通过有智慧的战略选择和有成效的外交作为,去掌握和使用这把钥匙。在这方面,中国借重俄罗斯的力量抗衡美日,就具有在东西两向确立机动位置的意义。因此,应该在地缘政治的大陆方向采取较为主动的行动,其主要方面是:第一,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赋予地缘政治意义和结构性意义,并共同反对美国NMD及TMD的部署。第二,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如首脑会谈机制、外长会晤机制等。应以北向和西向地缘战略地带建成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中最可靠的安全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中国国家战略和外交的缓冲地带和战略纵深地带。中俄关系改善可带动中印、中蒙关系及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改善。积极参与建构地区安全体制,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合理配置“稳定周边、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对外战略的关系。

9、要继续大力提倡新安全观和新安全模式,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形成自己的综合安全战略。中国曾是不结盟和大国伙伴关系的主要提倡者和推动者,在推进大国伙伴关系时,中国大力提倡新安全观和新安全模式,并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这种新安全观是一种集体安全观、体系安全观和制度安全观。在新安全观指导下,中国应积极改善和发展同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和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以促进周边安全、稳定周边局势。应建立地区信任机制,形成新的安全模式,它应包括

实施双边和多边信任措施,建立互信机制,促进多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和磋商机制。这是增加多极化进程中机制化措施的主要所在。

10、在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中国要敢于树立旗帜,树立旗帜是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重要方式。中国改革开放20年是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外交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多年来,中国外交一直是动态的,中国政府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新主张。1985年,面对美国、日本和东盟等国家纷纷就亚太地区合作问题提出主张的情况,宦乡同志就强调过:在亚太合作上要树立中国自己的旗帜,以施加中国自己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影响。1988年,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99年江泽民提出确立新安全观,这些都是带有积极主动性质的主张,对国际格局的走向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所谓提出自己的主张或树立自己的旗帜,实际上是参与制定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是不放手这方面的权力。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事实说明了国际体系的规则要变了。别人都这么看,为何我们自己却回避这一点。在这方面,中国所提出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新秩序,建立多极化结构及积极推进大国伙伴化关系等等主张,都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积极作为的表现,是树立自己旗帜的很好范例,是扮演大国角色的主动性体现。

11、增加外交的主动性和增值功能,以主动性外交适应和配合国际格局的变化。作为一个国际格局中的大国,中国应该是具有变化能力的大国。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国国力不够,就应充分使用外交的办法,例如以寻找和联合另外的力量支点来增加自己的力量和国际地位。这是外交主动性的表现,是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受制于国际格局变化的要求。

否则没有外交主动性,就会只有应对性外交。主动性外交要善于抓住外交机会,在必要时作出应有的外交姿态(如邓小平中越战争中对美国所采取的态度)。同时,注意加强中国外交的增值功能和扩张效应,使外交成为国家力量和综合国力的必要补充。此外,中国外交应该增加危机外交的意识,提高处理突发事件和危机的能力。[8]

在21世纪初的10年开外时间内,中国将进入国家建设目前的“十五计划”时期和后面5年的“十一五计划”时期,这将是国民经济再度迈上一个很大台阶和综合国力再度大发展的关键性时期。而与此同时,国际格局肯定是一个发生进一步变化的关键性时期,很可能的是,它将出现新的结构性改组。中国与国际格局的关系也将进入一个调整定位的新时期。正确分析中国与国际格局的相互关系,找准中国在国际格局及其变化中的位置,是保持中国国家战略稳健和敏捷的实质。

注释:

- [1] 香港《中国评论》2000年7月号,第38页。
- [2]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 [3] 类似的观点可参见哈里什·卡普尔:《开放的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7页。
- [4] 美国的战略是建立自己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推行单极化,它要触动国家主权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也要改变二战以来行之有效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 [5] 香港《中国评论》2000年7月号,第39页。
- [6] 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 [7] 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 [8] 自近年接连发生两场大型台海危机和科索沃事件后,国内不少学者都提出应加强危机外交的意识和增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